

我對於中西醫藥的看法

陳立夫

今天很高興能有機會來談談復興中國文化運動中，個人對於中西醫藥問題的看法。首先我們對於文化二字應有一個共同的觀念，我以為凡是人類在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一切創造或發明，都稱之曰文明；此種創造或發明其有影響於人類之生活或生存者，則稱之曰文化。文化顯然是具備了天下為公的本質，無中西之分，無古今之別，祇要對於人類有益，都應該大度採納；無益，始可拒而不受。國父對於中國文化，亦有同樣的指示說：「自己的好的應該保存，不好的纔可以放棄」，並且指出「對於吾國固有的道德智能，應從根救起，對於西方的物質科學，要迎頭趕上」，我對於國父的訓示，認為方針十分正確，所以遵守不渝，對於中國醫藥學問題所採的立場，亦無例外。

人類的進化為的是求生存，所以民生才是社會歷史進化的重心，所以我們對於殺人的工具和方法，求其愈少愈好，活人的工具和方法則求其愈多愈好。因此，在醫學方面如果中醫和西醫均有治一種病的特效藥和特效治法的發明，我們應該使其並存。又如中醫有桑葉薄荷發汗，西醫有阿斯匹靈發汗，就不必用阿斯匹靈來打倒桑葉薄荷，使鄉間病者非走上十多里路遠去買西藥不可，二者不可互相詆毀，互相排擠。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原是中國文化的特長，故有「道並行而不相悖」之信念產生，有存小異的雅量，乃能進世界於大同。

科學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不能離開事實的。無數次同樣的事實，給予人們以經驗和統計，再證之以實驗而不爽，才產生了定律和公式

，蓋事實勝於雄辯。所以幾乎每一個人對於中醫或西醫難免帶些偏見，因為如果他的家裡人被西醫醫錯了，險險把命送掉，卻被中醫醫好，他一定從此信仰中醫，反之亦然。但是人體的構造是最複雜不過的有機體，科學雖然天天在進步，但是不知道的部份還是太多，同樣的藥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其效果未必同，有時候並且會有奇異的反應。由於科學方法的進步天天繼續不斷在研究，所以漸漸深入其堂奧，但是距離目的地還太遠哩。舉個例子來說：三十年前西醫都相信小孩的扁桃腺有種種壞處，非乘小的時候把他割去不可，所以醫院中常常看到小孩們排長龍等割扁桃腺。以後復發現了扁桃腺是人身第一道防線，不能割去，割去了壞處更大，於是再也沒有小孩把好好的扁桃腺割去了。前面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後面也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而後者與前者的理論完全相反，這是從人體實際試驗一段較長時期獲得了經驗後，才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那末中國醫藥經幾千年用人體實驗所獲得的經驗統計，難道就可以用「不科學」三字抹煞一切嗎？醫學確是一種最難的學問，必須要極聰明而又好學的人，才有資格學醫啊！

西方醫學由於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隨之而迅速進步，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如果沒有物理學家發明X光及顯微鏡，人體內部情形看不到，細菌學無法得到實證；生物化學如果不進步，各種藥物的實驗無從實施，藥物的製造亦難順利進行。其他如電氣、電子、機械、化工，甚至鑛冶等專門學問及工程部門對於醫學都有不少直接間接的貢獻。但是到了今天，許多疾病的原因或還沒有找到，或還沒有根本治法。據一位有名的外國醫生告訴

我，內臟的病在西方已經有把握能醫治的至多百分之二十五，所幸外科進步得快，五臟中不健全的部份，可以動手術割去，若是僅靠藥物來治療，那就時間等不住了。所以在醫學本身方面，有待研究發明的太多了，我們應該多麼虛心才對啊！

中國醫學的理論基礎是易經，他是分析宇宙間的象理數的一部鉅著，應該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因為他所用的都是符號，後人漸漸不懂了。自從四書五經被剔出學校教程之外，其中最難懂的一部易經，自然更沒有人去讀而漸漸失傳了。這是一部中國文化精神所寄的最重要著作，為四大聖人智慧的結集，是合天道人道為一原理之鉅著。其中所稱陰陽五行之變化，盡合力學之原理，從永久在動的變化的宇宙中，尋求出不變和應變之道理而以卦爻釋之，此種道理，可用之於人生及社會，是為孔學與老莊之學；用之於軍事，是為孫子兵法；用之於治病，是為醫學；其他如名家陰陽家等等學派無一不源於易經。中國醫學之最高原理，即「致中和」三字而已，人體內一部份機能失去均衡（中和）即是病，藉外力（藥物）之助使之復返中和即是健康。由此原理以研究各種藥物之特性，及其所屬於五種基本動力（五行）中為何一種，與其所影響者為體內何種機能，再研究人體內部各部門相生相剋之道，然後能對症下藥，使復中和，是一套極完整體系的醫學及藥物學。假定人們沒有成見不誤認中國文化不值一文錢的話，則一定承認在中國學科中，醫學及藥物學均為自成體系的一門科學，再不會妄以「不科學」三字抹煞一切；如果我們認為國父的科學的定義「凡是有組織有系統的學問就是科學」沒有錯的話，藥物學分類之細，說明之詳，不亞於今日之生物化學，所不同者其用詞不同與不合乎時代所習用名詞而已，合動植物礦物有七百餘種之多，可謂洋洋大觀了。

有一位懂得醫的美國傳教士和我談起，他說很驚奇中國一般老百姓對於醫學常識何以如此普遍地豐富，對於某種食品對某種病可食或應忌食，亦多說得出。我告訴他：（一）我們都是黃帝神農的後代，前者是醫學專家後者是藥學專家，我們對於醫藥智識，是應該豐富的；（二）和美國今日一樣，聯邦政府有專管藥品及食品的機構（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周朝已經有了，在周禮有醫官食官之設置專管民間醫

藥及食物的記載；（三）中國醫學在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不獨內科已高度發展，外科亦已極其進步。後漢書卷八二華佗傳（約當西曆一八四——一九〇年）已有如下之記載「……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腹胃，則斷截瀉洗，去除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俱平復……」查麻沸散在西方，一直等到一八四七年才由英國單伯森氏所發明；（四）生理和心理的關係，中國醫書早有詳盡說明，例如「息妄念以養心氣，絕躁怒以養肝氣，寡言語以養肺氣，節飲食以養胃氣，淡色慾以養腎氣」等，在西方方面對於此類問題之研究，尚為不久的事；（五）針灸為中國所獨創的一種醫學，完全用物理方法治療而且製有銅人，以示穴道所在，若非精于解剖學，曷克臻此；（六）中國食品大都涉及及到藥理方面，尤其是補品，所以幾乎每日都有聽到醫藥教育及常識之傳授，食物種類與各種病的禁忌在西方尚為新的學問；（七）其最主要的是中國醫生開方必寫脈案，首先說明症象，次涉其診斷，再次說到治理方法，最後列舉藥味及其分量。故每一藥方，是一份完善的講義，流傳于民間，其不能寫出脈案者，稱為庸醫。西醫則無此辦法，祇寫洋文藥味，誰都看不懂，多問問，還惹他發脾氣。由上述可以知道中國人對於醫藥常識豐富的原因了，彼始恍然大悟而去。

中國人很看重醫生，良醫恒與良相並稱，中國醫生認為行醫不是為賺錢而是為救人，和西方醫生觀念完全不同。在美國行醫的中國醫生，個個賺大錢，因為他肯詳細答病人之問，半夜三更肯出診，「德本財末」之古訓，還未全忘。美國醫生多半是猶太人，他們重利觀念是世界聞名的，中國醫生將來如有過剩，還可以出洋呢。最有趣的消息，是舊金山市政府主管藥物的美國人，他全家的人有了病，都非吃中藥不可呢。

中國有些西醫往往對人說：「中藥還可以，中醫是不成」，因為他們聽得有人因運用科學方法提煉麻黃中藥以治氣喘症，在外國享大名發大財，所以就作這種斷語，我聽了真是好笑，試問藥能不透過醫生及醫理，會自動治好人的病麼？何況在二世紀時張仲景書上早已有麻黃能治氣喘的詳盡記載呢。中國常用藥物，約七百餘種，其藥性功效已有一百餘種為世界醫藥界所公認，所缺的是中間這一段化學分析和說明而已。我希望這一個大

寶藏，有多人去發掘，對于世界人類，必有鉅大之貢獻。

總之中西醫學有其基本不同點，一則視人爲人，爲一小天地，人自身隨時具有調整之功能。一旦均衡失調太過時，祇要稍得適當之外力（藥物）之助，可以回復中和。天地有四時季節，人亦宜與之配合，必要時亦可以人爲方法（用涼藥或熱藥之助）強之春行秋令，或冬行夏令，使體內毒素（即細菌之別稱）因環境突變，盡歸消滅，戰事一了，和平又現。體內某一部份有病，其原因或在另一部份，所以應通盤規劃，對症下藥，故症有虛實，而治法各異。西醫則視人爲物，體內各部份無一不是物，一物有病則治之，不能治則割去之，當然頭痛則醫頭，腳痛則醫腳。根據自然科學及機械等原理，這是一點也不錯的，血液中有發現有外來強盜（毒菌）則注入警察（抗毒藥物）以捕殺之，此亦不失其方法之一種也。由于中國文化偏重于人的研究，故一切都從盡人之性入手；而西方文化偏重于物的研究，故一切都從盡物之性入手，若雙方能相互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則必有一天能雙方拉頭，同爲參贊天地之化育而盡力。醫學者，乃參贊天地之化育之重要工作也，舉中庸所云以證之：「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盡人之性既能進而盡物之性，則盡物之性，何以不能進而盡人之性耶？二者既可貫通，自能互相發明，惟在人之誠與不誠而已。

回憶民國十九年中央國醫館在南京成立後，焦易堂先生爲館長，本人即被該館理事推選爲理事長，當時有不少人問我：「你是一個學科學工程師者，何以竟對這種不科學的中醫，感到興趣，你不怕人罵你思想落伍嗎？」：「我說我不怕，因爲科學二字照國父的解釋，凡一切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都稱爲科學，何況中國醫藥學是經幾千年以人體作實驗所得的統計結果呢。如果他是精通自然科學又明中國易學來向我證明中醫不科學，我可以佩服他，否則，自己既不明科學及易學而又妄指中醫不科學，我祇能向他笑笑。」一個學西醫的寫的是洋文，說的亦是洋話，他對於中國經籍及醫典很少讀過，居然敢以「不科學」三字抹煞中醫，我祇能說他膽大妄爲，自己不能配做一個科學的醫生。民國廿一年，我有一位同事在漢口天主堂醫院患腹

膜炎症，發高熱醫生束手，診斷祇有六個鐘點可以維持生命，方巧名醫張簡齋先生來訪，我就一把拖他去醫院，他說尚有一線希望，開了方，煎了藥，我就用熱水瓶帶藥給病人吃，居然熱度立即降下來了。連服一劑熱度回復正常，不必送太平間而準備出院了。次晨我去醫院醫生很奇怪，我向他報告經過，並向他道歉說，我不應將中藥帶進醫院，不過救命如救火，死馬當活馬醫罷了。請猜猜這位醫生怎麼說？他說「這不是中醫的效果，是上帝不要她死罷了」。嗚呼！世界上竟有如此不重事實的醫生，成見之深，竟至於此者。有了事實而不肯進一步去研究實驗，才真是反科學，阻礙科學進步，科學界的蠹賊，就是這種人。我當時又氣又怒對他說道：「你是科學的罪人，我才是上帝呢」。所以我不怕人家罵我思想落伍，「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過這還不是我支持中醫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爲我是革命黨員，社會中不平的事看不入眼，尤其是假外人的勢力來壓迫中國人，我要「打不平」的。那時候衛生署成立了，他們的辦法是要用政治力量來壓迫及消滅中醫，後來國醫館成立，他們看消滅不了，改採「任其自然自滅」的政策。他們根本不明白什麼叫「政治」，國父稱管理家人之事就是政治，若是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的事放棄不管，僅管極少數老百姓的事，這能稱爲好政治嗎？何況這是一件有關人民生死存亡的事呢。那時候西醫僅集中於少數大都市，祇有極少數有錢有勢的人（當然連政府官員在內）才請得起，其餘所有的老百姓，都靠中醫在招呼，他們的保健是在「任其自然自滅」的中醫政策保護下苟延殘喘着，到現在主持衛生行政的人，依然沒有放棄這種觀念。

我當時激於義憤，大聲疾呼，勉強減輕了中醫所受的政治壓力。但是問題的中心，是要有足夠的醫生，來擔當七億人民的保健工作才對，即使全用西醫，再加一百倍，還是不夠。何況要培養成一個醫生，從大學一年級算起，需要十年，我們不能久待，須得面對現實。所以我在擔任教育部長任內，每省設法建立一個醫學院，培植人才，以應急需。所遺憾的，未能同時多成立中醫學校，使中醫有同樣培植的機會，中醫師檢定考試，已經考試院舉辦，但是中醫師始終在「妾身未分明」的地位下受罪。

一件奇特的事在大陸出現了，十餘年前毛匪有病，史達林派個醫生來

爲他診治，毛匪怕蹈捷克共會被史藥死的覆轍，說他祇信中醫不信西醫爲理由以作擋駕。這話傳出，中醫得救了，現在大陸每一角落裡，凡有醫務所，就一面中醫，一面西醫，讓人民自己選擇，而對於中藥研究，亦頗有成績，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把中醫革去。這當然是由於匪區缺乏外匯向外購置西藥所致，但是事實的需要，使他們不得不在萬惡中做了一件惟一的好事來，我們聽了不免有些慚愧。

我一向希望西醫中有志之士挺身而出，將中醫中藥科學化。我更希望中醫不要故步自封，將凡可有助於望聞問切的科學工具先去學會。用熱度表總比手摸摸頭要準確得多；用科學方法查血糖量血壓檢查內臟功能，總比憑猜度要精密得多。人類爲生存的一切發明，是供全人類無條件享用的，知己知彼，才能進步，才能勝於人。但是後來我發現我錯了，中醫和西醫個個都對於其本身業務已忙不過來，那有時間來做這些極艱巨的工作呢，除非國家拿一筆大經費來養若干專門人才，專做這事才行。

我於是想自己去下一番苦功，把匹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裡的中文圖書館(Gest Library)中收藏最豐富的中國醫藥圖書用科學方法整理一下，這是一位被中國定州眼藥醫好了他的眼病的一位美國工程師所出一筆錢收聚的中國醫藥書籍，在自由世界中爲首屈一指。我的計畫被一個基金會通過了，允許第一年補助我兩萬美元，結果那一位幫我申請的教授，見了錢眼紅了，想搶去獨自辦理，結果基金會不肯給他，就告吹了。這是十分可惜的事，但是我並不灰心，我現在決定先從研究易經做起，希望能寫出一部使人人能了解的易學，則中醫的理論基礎，亦可因之建立起來。將來如天能多假我數年，再來辦一個私立中西醫藥研究所，使世界兩大醫藥學體系能融會貫通，希望你們不要笑我多事呢！

我現在僅僅希望：

- (一)衛生行政機關要扶掖中醫不再採用任其自生自滅政策。
- (二)教育行政機關不要將唯一的中國醫藥學院變成了一個西醫式的醫學院，將唯一的中國醫藥研究所充實其經費與人才，使中醫藥能向前進步，並頒布中醫學校課程標準。
- (三)希望社會上多幾位如顧又霞女士之流研究中藥，更希望多幾位如許

鴻源先生之流改良中藥製法。

(四)希望各基金會對於中醫中藥之研究者予以獎勵，對於有價值之著作如謝明才楊再華兩先生所合著「臺灣植物名集」等書，予以獎助印行。

我深信現在世界上不治之症，將從中國醫藥書籍中找到藥物和方法而醫治，我們不必等人家來向我們求，我們應以自己研究之所得，以貢獻於人類。「從根救起吾國固有的道德智能」，不專爲自救，而且爲救人，「迎頭趕上西方的物質科學」亦是爲的是同一之目的啊！

大「壽」字中堂立軸一幅

特價實售一百六十元

海外訂購美金四元五角(包括郵寄費)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公元一七六四年生，一八四九年歿。清乾隆五十四年進士，乾隆間迭官學政內閣學士及侍郎。嘉慶道光兩朝，外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等總督；內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傅。道光十八年致仕，二十九年卒，諡文達。元淹貫羣書，長於考證。所以在以提倡學術自任。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輿設學海堂在浙設詁經精舍，又輯經籍纂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山左兩浙金石志，彙刻學海堂經解、鞏經室集等書。此軸作於癸卯，即公元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阮氏已屆七十有九之高齡。

臺灣商務印書館經銷